

第一章 追寻天国的人们

——中国僧尼众生相

一、佛法东来

只是在转瞬间，远古文明的身影就消逝在历史长廊的那一端。余下的，只有长廊中依稀的空谷足音。我们便是循着先人遗留的这些典章制度和文化遗产，去勾划那些占据历史时空的辉煌文明和它们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在人类文明史中，曾经有过灿烂的亚洲文明。

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和绵延千里的喜马拉雅山，横隔了两个完全异质的文明：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在这两大文化圈中，都曾经出现过各自的图腾和崇拜，而且有了各自的原始观念。他们把所有的事物都视为是有生命的，认为万物皆生、万物有灵、万物有序、万物皆变、万物皆有善恶，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各自的宗教。作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宗教给信徒以三个方面的精神安慰：对现实苦难的抚慰和超越；对终极关怀的确立和满足；对道德行为的核准和愉悦。在这片最早蕴育人类文明的东方土地上，在距今 5000—3000 年间，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这个年代开始的时间要比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马尔城的时间早了 1000 年 比欧洲最早的文字早了 3000 年。

这两个文化圈的早期宗教，尽管也存在某种程度和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但在彼此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在中国文化圈，虽然没有形成过世界性的宗教，缺乏世界宗教共有的许多要素的道教和儒家，如果究其实质，则更像哲学、伦理、宗教三合一的产物。从最早时代起，炎黄子孙就把握和实践了某些宗教观念。华夏祖先将世上诸般事物都赋予了活生生的灵性，于是猪、马、牛、羊、鸡、狗作为被人们驯服的“六畜”是有灵的，而且虎、狮、蛇、蜜蜂、蜗牛等野生动物也是有灵的，甚至草丛、灌木、花卉和森林也都是有灵的，树有树精，石头有石头精。人们将万物按善恶进行了划分，“精”是中性的，有好的“精”，也有坏的“精”；妖、魔则是充满了恶性，更加狡猾，它们会随时到处奔袭人类。“精”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如果生活中不小心将血滴在扫帚上或者棍棒上，就必须小心处理掉，倘如将之束之高阁，三年后就会成精。也不要使自己的排泄物落到某种灌木丛里或某种昆虫身上，否则也是会成精的，这些“精”能偷走人的精髓。怀孕期的妇女也是要讲许

多规矩的，她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心灵的宁静，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食用兔肉做的汤或菜，否则她生出的孩子将会是兔唇。任何人不得移动她用的床、碗碟或其他重家具，因为那样会惊动地下的精灵，这些无形的力量肯定会加害于那个将要出生的生命。盖房子时如果让孕妇进去甚至接近都会导致塌方或者剧烈的震动，这是一种天经地义。钉子也是不能钉的，因为这将会把潜藏的精灵刺伤而会招致精灵的报复。

华夏先人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三部分，有天堂、阳间与阴间的不同。如同别的许多教派一样，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宇宙显然具有多神论和泛灵论的性质。天神和地神受到人们特别的敬重和祭祀。春秋两季，古代中国皇帝都以精心制作的昂贵牺牲献祭天地，以求风调雨顺，地有肥力，祈一个平安、丰收的年头。除了天地之神以外，还有许多地方神灵供人们祭祀和崇拜。一般把福神称之为神，他们生活在光明之地，与太阳和春天同在。一般把邪恶的神灵称之为鬼，他们居住在黑暗的地方。这就是天堂和阴间。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则生活在阳间，有生老病死，有悲欢离合；有春夏秋冬，有阴晴圆缺。先人为了寻求解释自然和宇宙的基本原则，创立了阴阳范畴。推动宇宙运动的东西乃是此二种力量间的对立统一。阴是自然中的否定性力量，它象征暗、凉、雌、湿如大地、月光、阴影等。阳是自然中的肯定性力量，它象征光、明、暖、雄、干、太阳等。人体本身乃至万

事万物，都是阴与阳的结合物，是阴和阳对立统一的运动。由阴与阳，到太极与无极，先民们对宇宙的思考推向了更深更高的层次，产生了周易预测学。

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和孝亲与崇祖的伦理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文化圈的宗教：道教和儒教。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次大陆上，古印度的先民们创造了对印度乃至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的不同类型宗教。在万物有灵论、巫术、占卜、禁忌、图腾、祭祀、放行礼、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观的基础上，古印度文化圈的复杂文化氛围和种姓制度中，产生了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在几个世纪中，它曾经是印度最有吸引力的宗教。到了公元前 3 世纪，教会专制的组织形式使它取得了优于一切其他宗教的专断地位。当时印度的统治者醉心于这一新的宗教，派遣佛教传教者进入毗邻的亚洲国家。教会力量的强行推进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它成功地席卷了中国、日本、朝鲜和印度支那国家。然而有趣的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正当其盛传于国外而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时，在国内却渐渐被重新恢复活力的印度教排斥在一旁，而后，是征服了印度的伊斯兰教给了佛教的最后一击，将佛教残余粉碎殆尽。

释迦牟尼九泉有知，一定会唏嘘不已。

公元前 6 世纪，青藏高原的两侧有两位伟大的圣人，为着人们的精神家园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奔走在中原大地的孔

子，为了建立一个仁的天下而呕心沥血，风餐露宿；跋涉于恒河两岸的乔达摩，则是苦心修炼，求道求悟。

乔达摩的本名叫乔答摩·悉达多 悉达多的含义是“成就者”人们也称他释迦牟尼 即“释迦族中的圣人”。当他成道以后又常被简称为佛陀 意为“觉者”或“觉悟真理的人”。佛教的得名也便缘于此。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母亲摩耶夫人是邻国国王的长公主。居住在这里的释迦族是公元前 2500 年前后，从北方南下的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后裔。他们凭着游牧民族的勇猛征服了印度河流域深肤色的土著居民，吸收了先进的农业文明而定居下来，并建立了许多小国。到公元前 6 世纪，印度次大陆的政治中心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恒河流域，形成了 16 个强盛的国家，其中最强大的是摩揭陀、拘萨罗和跋耆国。这三国的都城都成了释迦牟尼后来传教的主要场所，迦毗罗卫国只是拘萨国的一个附属国。

释迦牟尼生逢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和宗教非常盛行的时代。当时印度各国通行种姓制度，种姓即为颜色、肤色之别。白肤色的雅利安人和土著人分别居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这两大社会等级集团各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预，形成两大对抗阶级。后来，雅利安种姓内部又派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土著居民则为第四个种姓，即首陀罗。第一等级婆罗门为僧侣，自认为是创造宇宙的“梵天”的代表，掌握神权，

主持祭祀，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社会地位最高；第二等级刹帝利为武士，包括国王和文武官吏，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是国家世俗统治者；第三等级吠舍为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商人，负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等义务，是被剥削者；第四等级首陀罗为奴隶、杂役、仆人，是社会的最底层。四个种姓之间等级分明，壁垒森严，其社会地位、权利义务、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绝然不同且自成一体，世代相袭。

释迦牟尼的时代，刹帝利由于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军事事实权的增强，对婆罗门享有的特权日益不满，因而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沙门思潮”。同时，工商业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也试图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奴隶也以各种方式反抗压迫。婆罗门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被不同程度地削弱，表现在思想领域，则是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新思潮层出不穷。释迦牟尼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创立佛教的活动，释迦牟尼倡导的众生平等学说，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印度各国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

乔达摩自小就表现出非凡的善心和悟性。他一生下来就能说会走，释迦牟尼向东南西北各走七步，步步生莲花，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高声说道：“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他浑身呈金黄色，更有三十二种异相，所以净饭王为他取名悉达多，意为“奇异吉祥”。诞生后不久，一位占相的阿私陀仙人来谒见净饭王，相过太子面后预言：“太子今后若在家，定为转轮圣王，统领天下；如果出家，定能证成佛果，利益天人。”预言令

净饭王深感不安，极为担心太子应验了后者而出家。因此，他想尽办法让儿子安于世俗生活，处处设防，不让他看到人间的丑恶、贫困和穷苦。国王特别不让年轻的王子看到四种东西：尸体、老人、病人、苦行僧。16岁时便为他纳婆罗门种姓的摩诃那摩之女耶陀罗为妃，建造春、夏、秋三时宫殿，广造园池台，物色大批宫娥彩女，供他游玩取乐。

然而这位王子却是天生的世俗叛逆者。他好沉思而少言，总是悲天悯人。越是荣华富贵，越觉得这一切到头终是一场梦境，总想认识宇宙人生之究竟实相，寻求一个彻底的解脱之途。他百思不得其解，便出游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第一次出游，见到的是一位老人；第二次见到一个病人；第三次见到的是个死人。这完全打破了父王为让他安于世俗而设置的樊篱。而第四次他恰恰遇到了一位苦行僧。前三次所遇正好象征了人间的一切苦难。当他遇到这位梵行沙门，幅圆顶法、威仪有度、托钵持杖、怡然自得的比丘形象时，灵智豁然开悟，从此下了出家修道的决心。

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这位 29 岁的王子不顾父王的劝阻，抛妻别子，骑着一匹白马悄然出宫。他脱下珠光宝气的服饰，剃去须发，披上袈裟，从此踏上了苦行的征途，成了一名修道者。这一天是中国阴历的二月初八，后来汉族地区的佛教徒以这一天为佛出家日。他诞生的阴历四月初八则被我国汉族地区和日本定为浴佛节，受南传佛教影响的傣族和东南亚地区佛教徒则把佛诞日定在清明节后十天，并发展为“泼水节”

的传统节日。

以后的六年里，乔达摩到尼连禅河旁伽阇山的密林深处减食苦行，又曾到摩揭陀国寻访阿逻罗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修习禅定。他历尽艰辛，坚持不懈。他“日食一麻或一麦”，晚上躺卧在荆棘上，而且常常连续站立一天之久。他从不洗澡，积满污垢的身体使他看上去像一株老树，身躯已经形如枯槁，气息奄奄。然而均未能获得真谛。

这种苦行并未能达到觉悟，乔达摩开始了重新思考。在尼连禅河，他一洗 6 年的积垢，接受了一位好心牧羊女给他的一碗米粥，恢复了元气。这时随太子苦修的侨陈如等五个侍者，认为他为色、食所迷而放弃修道，便离开了他，自行到波罗奈鹿野苑中苦行去了。矢志不渝的乔达摩来到菩提伽耶附近的一棵菩提树下，面对东方，结跏趺坐，发誓不证到无上大觉决不起身，“不成正觉，誓不起坐”。七七四十九天的澄思静虑，终于豁然大悟，觉悟成道。由此得到了整个佛教学说之理论基础——“缘起论”。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因一定的条件而产生的（因缘而起），一旦这些条件起了变化或不存在，该事物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不真实的，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与幻影。正因为如此，人生在世，不必过于执著，既不要执著外境外法，也不要迷恋自身。如果人们能把外界和自身都当作一种假象，便不会有所追求，因而则不会生老病死等痛苦，如此也就灭烦恼得解脱了。

这个获得无上大觉的清晨，正是中国阴历腊月初八。喝

“腊八粥”即源于斯。

这一年 乔达摩·悉达多 35 岁。

乔达摩·悉达多就成了获得无上大觉的佛陀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顿悟成佛后，立即奔向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寻找那五位曾经诅咒过他的侍者，向他们宣讲自己获得彻悟的道理，提出了通往佛家最高境界的“涅槃”的修行之路。五位苦行僧接受了他的学说，成了释迦门下最早的五位弟子，组成了第一个“僧伽”组织。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初转法轮”。之后 释迦牟尼宣扬他所证悟的“四圣谛”、“十二因缘”等佛法。此时，佛教之“三宝”——佛、法、僧已俱足；佛”就是释迦牟尼，也称如来；法”就是“四圣谛”等佛法；僧”就是乔陈如等信徒。

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正式创立了。

此后 45 年中，佛陀席不暇暖地到处奔走，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以摩揭陀、侨萨罗、拔沙三国为中心，有 25 年在侨萨罗首都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他东到瞻波，西到摩偷罗，宣道的范围相当广泛。佛陀 80 岁那年，在毗舍离染上了重病，后误食毒物，病更加剧。在拘尸伽那河沐浴后，在一处四方各有两棵婆罗树的地方安置了绳床，枕着右手侧身卧躺，头朝北，面向西，双足并拢，这就是佛涅槃像（说卧佛像是错误的）。凌晨，他最后说：“存在是无常的。认真努力吧！”这就是如来最后的言教。”说完后佛陀再未言语，微闭着双眼躺在那里，月一样的安祥，海一样的平静。当他暖暖呼出最后一口气时，霎时间，天上雷声大作，大地轰鸣颤抖。这一天是阴历二月十五

日，汉族地区佛教以这一日为佛涅槃日。

这位置权力、利禄、爱情、生死于度外的伟大思想家，为了真理，为了救民于苦海，付出了一生！

到了公元前 2 世纪末，自古沉寂的昆仑山麓和天山山脉终于传来了悠扬的驼铃声。伴随着骆驼商队的缓缓行进，佛教开始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除了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佛教也从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 18 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罽那世界（汉地），亦有史书载西汉哀帝元寿六年（公元前 2 年）便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月氏国使臣伊存口授佛经《浮屠经》。

最有趣的当推汉明帝的佛陀梦了。汉明帝刘庄在梦境中见到一个奇伟的神人，端坐宫中，忽又飞升起来，有金色的光明普照着神人的身躯。学识渊博的太史傅毅奏答说，臣闻西方天竺国里有一得道者，曰佛陀，陛下梦中神人必是此佛。

有此大吉之像托梦，汉明帝立即派遣中郎将蔡愔等 18 人作使者前往西域访佛求道。蔡愔等人历尽千难万苦自不必说，所幸的是在大月氏国便遇到了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愿意随蔡愔一行到汉地来传经，于是一行人等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回洛阳。明帝大喜，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命名为白马

寺。这两位印度僧人在寺内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即现存的《四十二章经》。

这是中国佛学界一般公认的佛法东传的时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

佛教初踏东土时，汉人都是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神仙方术的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的，且将佛教变成了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时，人们多把释迦牟尼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黄帝、老子相提并论，视为同类神，并列作为祠祀崇拜的对象。东汉末年，桓帝就多次在宫中亲祀老子和佛陀。当时信奉佛教的主要是皇族和上层贵族，他们将佛与黄、老并列起来，当作一种神仙进行崇拜，以求长寿多福。作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明帝的异母弟弟楚王刘英经常与西域高僧、中国佛教徒们一起祭祀佛陀，并使佛教传到了南方。

佛教经典的译介是与佛教的东传并行不悖的。灵帝、献帝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中国，佛经才开始大量地翻译。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始于安世高，即所谓“安译”。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比较接近神仙家言，另一系统为“支译”为支类迦讖系，是大乘法佛教，主要宣传性空般若学。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也各有传译。

佛教踏上中华大地，是那样悄然，又是那样温和，全然没有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没有像十字军东征那样充满血腥，更没有近代中国在基督教面前那样局促不安，那样难以接受。一

个民族在两个不同宗教面前绝然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是多么耐人寻味！19 世纪的中国，已是国门紧锁，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停滞的社会僵化的思想整个社会是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高度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与思想僵化是内外相统一的。一个民族的政权机构和民族心理因“定于一尊”而逐渐僵化当外部强权冲击这个政权外来文化拍击这个民族敏感而脆弱的思想堤防时，其社会变迁就必然痛苦不堪。19 世纪的基督教正是在枪炮声后和无数的洋货一起驰骋在中国大地上的因而必然引起民族感情的浓烈升腾形成猛烈的反洋教运动。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1861 年“贵阳教案”，1862 年“南昌教案”，1870 年“天津教案”、“四川”大足教案’，1891 年江苏“扬州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1895 年福建“古田教案”，1898 年湖北“宣施教案”，等等。这些反洋教事件终于汇合成浩浩荡荡的义和团运动高扬的旗帜就是“灭洋”。

然而佛教东传中国，却远不是人们感觉的面目狰狞。尽管同样地高鼻深眼中国百姓却能亲近它中国文化带着泱泱大国的气度欣然接纳了它，而且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那些流光溢彩的佛像随着踏往神州各地的漫漫践履眼睛渐渐平了，鼻子也漫漫低了，终于换上了一幅中国人的面孔。在思想上通过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融汇贯通儒、释、道合而为一。在生活中，佛教在中国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是因为它的世俗化。佛教在中国，不只是遍地春笋般的寺庙塔林，

不只是几乎占尽名山的石像山佛，而且渗透到各种艺术形式中、各式文学作品中。它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民族血液中的一滴血，成为一门学问，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已融为广博的民族精神。重实际的中国百姓则将佛陀请入家中，把男观音塑成大慈大悲的女菩萨，一束香火，一盘贡品，把复杂严格的宗教仪式简单化，完成了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不必出家，无须苦行，只要顿悟，佛教就这样深入到寻常百姓家中。

分析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就不可不探寻二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就像考察欧洲文明必须洞察古希腊、罗马的影响，希伯来的痕迹一样。

一言难尽的中国佛教。

佛教得以东弘中华并根深叶茂，其观念上的基础仍是中国故土上广为流传的原始宗教观念。当时人们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是极有代表性的，“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佛教本来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佛本身变成了神。作为佛教“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本来与中国的“灵魂不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佛教刚传入中国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神不灭”成了佛法的根本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在这个时期，长期垄断中国思想界的儒学发生动摇。儒学发展到汉代，一方面逐渐变成经文的训诂解释学，空洞教条，枯燥乏味，另

一方面，又逐渐和讖纬神学相结合，用讖纬解释经义，堕落成一种宗教迷信，于是也渐失权威。倒是佛教的《般若经》和《维摩经》的空观思想很像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因而吸引了许多士大夫的兴趣。“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知识分子，和王弼、何晏等一起主导了魏晋思想界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中国固有的清神土壤，为后来中国佛教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隋唐时期。

东晋南北朝（公元 317—589 年）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大地扎下根来的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反复、经常的杀戮和毁灭，弥漫于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皇族之间、宗室之间；“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路道断绝，千里无烟”。多少雕梁画栋转瞬即是瓦砾，多少荣华富贵，转眼就成过眼烟云。王孙公子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瞻念前程，更是祸福未卜、不寒而栗。下层百姓则处水深火热之中，垂死挣扎。人们对现世悲观失望，自然会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对彼岸世界倾注无限热情，希望神佛保佑以去除苦难。佛教由此获得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一时期，大量佛典被翻译，中国佛界各种思想此起彼伏，学术论文不断面世。佛教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各宗学派纷起，主要有涅槃、成实、三论、毗昙、地论、摄论、楞伽等学派。南朝各代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其中梁武帝最为突出。他曾自称“三宝佛法僧之奴”，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

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并亲自登台讲经。北朝虽然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于公元 446 年和公元 574 年发动的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说来是扶植佛教的多。北魏文成帝和孝文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开凿佛教石窟，雕刻佛像并资助译经事业。与此同时民间信佛者剧增，独立的寺院经济逐渐形成，寺塔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这一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或经济上，都为隋唐创立具有中国民族色彩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时期（公元 581—907 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令今人都感叹不已的鼎盛气象，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空前的繁荣和辉煌，中国佛教进入了宗派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隋文帝统一南北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转而采取大力恢复和扶持佛教的方针，炀帝继承文帝的政策，但略有限制。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宗教实践还是佛学理论都有了极大的长进。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重视佛教的译经事业，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还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佛寺，悼念阵亡战士，以安抚人心。后来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把自己篡夺政权神化为是符合弥勒授意的。唐代佛教信仰更是广泛深入民间，极大影响了中国特色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成熟的中国佛教宗派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形成中国佛教著名的八大宗派：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智顗创立的天台宗；道宣、法砺和怀

素分别创立的律宗(共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善导集成的净土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慧能创立的禅宗、善无畏、金刚智、不安和一行等人奠定的密宗。一时间群芳竞妍,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形成空前绝后的中国佛教发展高潮。

自唐末五代以降,不再有辉煌的高潮。中国佛教在一片平稳宁静中,影响力略有下降。由于历朝历代统治者不同的佛教政策,佛教在各个地区的兴衰并不相同,各个宗派的变化也各异,表现为不同宗派的佛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宋代以后,随着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佛教日益与儒、道相融合,一些主要佛教宗派的基本观点为宋明理学所吸收。同时,佛教内部各宗也互相融合,其中以禅宗和净土宗、禅宗与华严、天台二宗的融合最为显著。

除汉地佛教外,佛教亦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西藏地区,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8世纪后逐渐形成喇嘛教(藏传佛教)至元初忽必烈封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为帝师,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15世纪以后,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创立的黄教(格鲁派)逐渐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派。藏传佛教具有浓郁的高原文化色彩,后又流传于蒙古等地区,并日益流布世界各地。

佛教东弘中华,以涓涓细流从西域出发,流入赤县神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挽起高山大河,汇合茫茫九派,终成浩荡东流水,奔腾向海,蔚为壮观。佛教步入东土,无论是在深度上

还是广度上都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它的影响，在儒教方面完成了宋学和阳明学，在道教方面发展了道教礼仪和教义。在工艺美术、天文数学、文学、音乐、医学诸方面，无不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二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佛教不仅汇入中国千年思想的脉流中，融入文化的五色土中，而且溶入中国人的脉管中，走进千家万户的堂屋卧室。二千年的流传与创造，佛教不仅尽占名山大川，而且足迹留遍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二千年的灵光闪耀，是与中国的比丘和比丘尼们——他们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寻觅者——分不开的，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耕耘者和传播者。

历史，留下了他们鲜活的面容和活跃的身影。

二、在天地之间的比丘和比丘尼

刚出生时，释迦牟尼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这位如来佛祖始终是佛教徒心目中的，立于天地之间空前绝后

的圣者。

在二千年的佛教发展中，少不了这样一群芒鞋缁衣的精神家园求索者。他们或青灯黄卷，静心修持；或一瓶一钵，云游四方。他们是人们灵魂的负重者，是人间与天国之间的超度者。作为佛教传播的主体，他们各种各样的身影留在了历史长廊生动的画卷上。

出家的佛门弟子是由“五众”组成的。比丘——和尚 比丘